“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难点与前景

张卓元

摇摇中国“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仍然具有良好的经济发展机遇，与此同时，资源、环境等瓶颈制约更加突出。人们形容“十一五”是“黄金发展时期”和“矛盾凸显时期”并存的阶段。特别是，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7年的高速增长，特别是2003～2005年9%以上的高速增长以后，能不能在“十一五”期间继续实现平稳较快发展，年均增长率保持在7%～8%之间，是各方面都十分关心的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此作出了明确、肯定的回答。本文拟对“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难点与前景，作一简要的分析论述。

一、“十五”经济高速增长为“十一五”时期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摇摇“十五”期间特别是2003年及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2003年和2004年GDP增速均为9.5%，大大高于2001年的7.5%和2002年的8.3%，2005年即将过去，这一年经济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也已无可怀疑，上半年GDP增速仍达9.5%，估计全年GDP将增长9%左右。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头四年半（2001～2005年上半年）取得非凡业绩，情况如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首先，经济逐步摆脱了紧缩状态，增速加快。2001～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增速达8.7%。2004年GDP为136876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计算为16550亿美元，人均GDP达1273美元。2004年GDP按2000年价格计算，达到1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已完成“十五”计划原定的12.5万亿元的目标，即提前一年实现GDP目标。[①] 根据计算，如果2005年GDP增速为9%（很可能达到），那么要实现2010年GDP比2000年翻一番的目标，2006～2010年每年GDP增速只需5.6%就能达到。可见，“十五”期间经济发展已为以后的发展和到2010年GDP翻一番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还要指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保持了物价的基本稳定，全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2001～2004年平均只有1.2%。

① 参见《人民日报》2005年5月15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001～2005 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指标（%）

年 份	“十五”计划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上半年
国内生产总值	7 左右	7.5	8.3	9.5	9.5	9.5
工业增加值		9.9	12.6	17	16.7	16.4
到 2005 年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	第一产业	13	15.2	14.53	14.4	15.2
第二产业	51	51.1	51.74	52.2	52.9	
第三产业	36	33.6	33.72	33.4	31.9	
城市化水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36.22（2000 年）	37.66	39.09	40.53	41.76	
城镇登记失业率	5 左右	3.6	4.0	4.3	4.2	4.2
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		0.7	-0.8	1.2	3.9	2.3
人口自然增长率	9‰左右	6.95‰	6.45‰	6.01‰	5.87‰	
财政收入（亿元）	13395.2（2000 年）	16386.04	18903.64	21715.3	26355.9	1639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5	8.47	13.4	9	7.7	9.5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	5	4.18	4.8	4.3	6.8	12.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34153（2000 年）	37595	42027	45842	53950	29610
2005 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6800	5097.6	6208	8510	11548	6450
国家外汇储备（亿美元）	1655.70（2000 年）	2121.65	2864.07	4032.51	6099.32	7110
2005 年固定资产投资率控制线	35 左右	38.8	42.2	42.4	43.9	
2005 年 R&D 占 GDP	1.5	1.09	1.1	1.31	1.35	

摇摇资料来源：国家信息中心

《2005 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工业增加值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

其次，工业生产迅猛发展，农业生产出现重大转机。2003、2004 年，钢铁、水泥、汽车、电力、煤炭等高速发展。钢材从 2000 年的 12850 万吨增加到 2004 年的 29723 万吨，翻了一番还多，其中 2003 年和 2004 年分别比上年增长 4856 万吨和 5615 万吨。水泥 2003、2004 年分别比上年增长 13708 万吨和 10792 万吨。汽车 2004 年超过 500 万辆，达 507.4 万辆，比 2002 年增加 182.3 万辆，增长 59%。发电量 2004 年达 21870 亿千瓦小时，比 2002 年增加 5330 亿千瓦小时，增长 33%。原煤 2004 年达 19.56 亿吨，比 2000 年增加 9.56 亿吨，接近翻了一番，其中 2003、2004 年分别比上年增长 28% 和 11%。与此同时，农业生产于 2004 年出现重大转机，粮食产量扭转了连续 5 年下降局面，2004 年粮食产量为 46947 万吨，比上年增产 3877 万吨，增长 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也扭转了前三年一直低于计划

指标5%的局面，增长率达6.8%。

第三，对外贸易大幅度增长，利用外资继续增加，实施“走出去”战略迈出重大步伐。中国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几年入世的正面效应好于预期。首先，对外贸易大幅度增长。2004年进出口贸易达11548亿美元，大大超过“十五”计划预定的6800亿美元的指标，比2000年4742.9亿美元增长1.43倍。2005上半年进出口总额达645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3%。我国外资进出口总额由2000年的世界排名第八位上升到2004年的第三位。利用外资继续增加，实际利用外资2001年为496.7亿美元，2002年为550.1亿美元，2003年为561.4亿美元，2004年为640.7亿美元。2004年，我国出口额占GDP的36%，进出口税收占全国税收总额的17.7%。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7.8%，出口占全部出口额的57%，交纳税收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0%。开放型经济领域吸纳的就业人数超过8500万。外汇储备达6099亿美元（2005年6月末又进一步增加到7110亿美元）。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也在增强，2004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7.5%，2003年中国进口额已占全球进口总额的5.3%。到2004年，对外直接投资累计370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累计1140亿美元，对外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累计308亿美元，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319万人。

第四，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十五”时期财政收入上了一个台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稳步上升。2004年全国财政收入达26355.9亿元，比2000年增加12960.7亿元，增长率达96.8%，平均每年增收3000亿元以上。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也从2000年的14.97%提高到占19.26%，提高了4.29个百分点。2005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完成16392亿元，比上年同期又增长14.6%。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是“十五”期间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亮点。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也在逐步提高。2001～2004年，城乡人民的收入水平都逐年提高，其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年增长都在5%的计划指标以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接近5%的计划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几年也有较快增长，年均增幅在两位数左右。特别是，这几年的物价稳定，2001～2004年年均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只有1.2%，2005年上半年上涨率也只有2.3%，均处于“高增长、低通胀”的最好时期。

第五，各项社会事业加快发展。2001～2004年，城镇累计新增就业3400万人，完成“十五”计划目标任务的85%，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的目标内。2004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16353万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10584万人，参加医疗保险人数为12404万人，均比2000年有较大幅度增加。2004年，全国共有2205万城镇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补助；年末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610万人，比2000年减少很多。教育事业发展很快。九年义务制教育基本普及。高等教育大发展，2000年普通高校在校学生556.1万人，2004年跃增至1333.5万人，增加了1.4倍。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比重，2000年为1%，2004年增为1.35%。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有重大进展，截止2004年4月，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已投入资金108.6亿元，建设2425个省、地、县三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项目；投入76亿元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建设项目2518个。

除此之外，十五期间，工业化持续快速推进，高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化程度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比1978～2000年年均提高0.4个百分点左右；形成了各有侧重的区域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取得进展，振兴东北地区等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

起开端良好；社会发展得到高度重视，公共服务投入力度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得到加强；等等。总体看，“十五”计划实施是比较好的，我国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有比较明显的增强。

二、“十一五”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条件

2005 年 10 月通过的《建议》提出，2006 ~ 2010 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隐低资源消耗的基础上，实现 2010 年人均 GDP 比 2000 年翻一番。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既积极而又稳妥的指标。鉴于“十五”期间我国 GDP 年均增长可达 8. 8%，如果“十一五”末 GDP 总量仍按过去设想比 2000 年翻一番，那么“十一五”期间 GDP 年均增速只需接近 6% 即可达到，这显然是低了，不切实际。根据这次《建议》提出的目标，则“十一五”人口自然增长率按国家人口计生委预测年均为 8. 8‰（2001 ~ 2004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实际年均为 6. 4‰），按人口平均 GDP 翻一番，则 GDP 年均增速要达到 7. 4%（2005 年假定为 9%）。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和近十年来的经验，这个指标是比较现实可行的，属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范畴。

为什么说中国经济“十一五”期间仍能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呢？

第一，中国有巨大的和不断扩展的市场。在新世纪纪新阶段，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领域的目标是，基本实现工业化，初步实现城市化，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国内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使中国的市场空间非常大，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最广阔的场所。例如，这几年我国房地产发展很快，房地产投资增速年均达 20% 以上，除了有部分不正常因素外，主要是由于广大群众对房地产有购买力需求旺盛拉动的结果。

第二，中国有持续的高储蓄率。中国的储蓄率高是全世界出名的，长时期在 30% 以上。据一份研究报告材料，1978 ~ 2002 年我国储蓄率在 32. 5 ~ 42. 2% 之间。1978 ~ 1981 年储蓄率逐年下降，从 1978 年的 37. 9% 降到了 1981 年的 32. 5%。1982 ~ 1994 年储蓄率呈上升趋势，1994 年上升到 42. 2%。1995 ~ 2000 年储蓄率略有下降，2000 年降到 38. 7%，2001、2002 年又回升，2002 年为 42%。[①] 高储蓄率支撑着高投资率，从而支撑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资本形成率[②]一直很高，1978 年为 38. 2%，“六五”时期为 34. 5%，“七五”时期为 36. 7%，“八五”时期为 40. 3%，“九五”时期为 37. 6%，“十五”时期 2001 年 38%，2002 年 39. 2%，2003 年 42. 4%，2004 年 43. 9%，有研究表明。1978 ~ 2003 年中国资本年均增长速度为 9. 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 3%，在 GDP 年均 9. 4% 的增长中贡献近 6 个百分点。[③] 能性有的经济学家担心，随着消费者信贷和信用卡的推广，中国的高储蓄率有可能

① 见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课题组《“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研究》。

② 资本形成率 = 资本形成总额 ÷ 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 ×100%。

③ 见王梦奎主编:《中国中长期发展重要问题》，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5 年 4 月版，第 4 页。

在短期内陡然下降，如象近几年日本和韩国那样。[①] 看来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至少在“十一五”时期不会出现大幅度下降的情况。

第三，基础设施建设已有相当基础。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普遍弱点是基础设施供应不足，影响经济起飞。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发展，情况已有很大变化，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铁路营业里程，1978 年为5.17 万里，2004 年达7.42 万公里，增长43.5%，“十五”期间可增加 6000 公里。公路 1978 年为 89.02 万公里，2004 年达 187.07 万公里，增长 1.1 倍。特别是高速公路，1990 年才 500 公里，2004 年已达 3.43 万公里，“十五”期间可增加 2.3 万公里。民用航空航线里程也大幅度增加，1978 年为 14.89 万公里，2004 年已达 204.94 万公里，增长了近 13 倍。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1990 年为 48321 万吨，2004 年达 246074 万吨，增长 4.1 倍。全国电话普及率，1990 年每百人为 1.11 部，2004 年达 50.8 部，其中移动电话 25.76 部。2004 年全国发电总装机已达 4.4 亿千瓦，预计到 2005 年底可达 5 亿千瓦，居世界第二位，其中“十五”时期新增约 1.75 亿千瓦。发电量 1978 年为 2566 亿千瓦小时，2004 年达 21870 亿千瓦小时，增长 7.5 倍。供水总量 1990 年为 382.3 亿立方米，2004 年为 489 亿立方米，增长 28%。污水处理 2003 年为 148 亿立方米，占当年排放量的 42%。等等。

第四，劳动力资源丰富并具有一定素质，科技教育也有相当基础。中国有世界上最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2004 年就业人员达 75200 万人，其中从事第一产业的为 35269 万人，占 46.9%；从事第二产业的 16920 万人，占 22.5%；从事第三产业的 23011 万人，占 30.6%。除了城镇有 1 千多万人失业外，在农村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中，约有 1.5 亿人是隐性失业者。中国不仅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且经过多年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制度，青壮年一般均具有初中文化水平，工资水平较低且受劳动力供求关系影响多年来稳定在较低水平上，工资成本低是中国出口产品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村劳动力将逐步向城市和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这本身就将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产出的增加。世行专家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 1979～1984 年和 1995～1998 年，生产率的提高分别有 70% 到 90% 来自于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城镇就业，因为城镇就业利用现代技术使得增加值大幅度提高[②]。科技事业快速发展。1990 年，我国平均每万名职工有专业技术人员 2416 人，2003 年增加为 3900 人。专利申请受理量，1991 年为 5 万件，2004 年增加到 35.38 万件，增长 6 倍多。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促使我国劳动力素质逐渐提高。

除以上四条之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企业活力和市场机制作用明显增强，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点，后面还要专门论述。还有，政治社会环境稳定，将为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的支撑和保障。国际环境对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也有利。和平、发展、合作已成为当今时代的潮流，世界经济仍处于增长期，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深入发展，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世界科技进步突飞猛进，有利于我国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技术的跨越发展和经济的迅速增长。

① 参见世界银行：《中国“十一五”规划的政策》（2004 年 12 月），第 28～29 页。

② 参见世界银行：《中国“十一五”规划的政策》（2004 年 2 月），第 24～25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三、资源瓶颈制约突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

我国经济和社会经过改革开放后 26 年的快速发展，特别是 2003 年以来 9% 以上的 GDP 高速增长，一部分行业（如建材、钢铁、电解铝等）已经出现生产能力过剩，今后还可能会有其他行业由于前期投资过热而陆续出现生产能力过剩。① 与此同时，资源瓶颈制约和环境压力也不断加大，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突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已难以为继。我国人均耕地占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40% 左右，2004 年为人均 1.41 亩，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以及人口的增加，人均耕地还将减少。我国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且时空分布不均。目前 600 多个城市中已有 400 多个缺水，110 个严重缺水。我国人均占有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储量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1% 、4.5% 和 79% ；45 种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铁、铜、铝等主要矿产资源储量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6、1/6 和 1/9。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已从 1990 年的 5% 上升到目前的 50% 以上。2003 年，中国石油消费量为 2.67 亿吨，进口石油 9700 万吨，对外依存度为 36% 。2004 年，中国石油消费量 2.92 亿吨，进口石油 1.23 亿吨，对外依存度达 42.1% 。2004 年，我国铁矿石进口 2.08 亿吨，对外依存度约 40% 左右。2005 年铁矿石进口将进一步提高至 2.4 亿吨，② 占世界自由贸易量的 50% 以上。铜精矿和氧化铝消费量的 50% 都依赖进口。中国资源进口不断增加，也助长了国际市场资源性产品价格的上涨。自 1999 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已上涨了近 4 倍。中国进口的铁矿石价格，2003 年上涨 30% ，2004 年上涨 80% ，2005 初上涨 71.5% 。

我国资源利用效率低，从资源投入与产出看，2004 年，我国 GDP 按当时汇率计算占全世界 GDP 的 4% ，但消耗了全球 8% 的原油、10% 的电力、19% 的铝、20% 的铜和 31% 的煤炭。③ 能源利用效率低，目前，钢铁、有色、电力、化工等 8 个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 40% 以上，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发达国家的 2 ~ 3 倍。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矿产资源总回收率比国外先进水平比低 15 ~ 25 个和 20 个百分点④。中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只有 30% ，城市水的回用率也仅为 30% 左右⑤。

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对环境压力日益增大，几近极限。2003 年，我国工业和生活废水排放总量为 680 亿吨，化学需氧量排放 1334 万吨，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 2159 万吨，居世界第一，90% 的二氧化硫排放是由于用煤导致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全国七大水系 38% 的断面属五类及劣五类水质，90% 流经城市的河段受到严重污染，大部分湖泊富营养化问题突出；近岸海域污染面积仍在扩大，赤潮灾害频繁发生；全国近一半的城镇水源地水质不符合原水标准，农村尚有近 3 亿人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酸沉降、光化学烟雾、细颗粒物已经在城市密集地区构成严重的区域性污染。世界十大

① 商务部材料，2005 年前 5 个月，39 个工业行业的产成品库存同比增长 19% ，特别是钢铁、电解铝等产品供过于求的矛盾比较严重。（《中华工商时报》2005 年 8 月 20 日）

② 参见《经济日报》2005 年 4 月 9 日。

③ 参见《中华工商时报》2005 年 6 月 26 日。

④ 参见《人民日报》2005 年 6 月 26 日。

⑤ 参见《中国经济时报》2005 年 7 月 1 日。

污染城市，中国占了6个。2005年年初，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最新的“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中国位居第133位①。

与此同时，生态退化问题也比较突出。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7%。沙化土地面积174万平方公里，且有扩展之势。草原超载过牧，乱采滥挖严重，鼠虫灾害频繁，全国退化草原面积已占草原面积的90%。

十年前，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和“九五”计划确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方针以来，我国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有的研究表明，我国1980~2002年单位GDP能耗下降了66.8%②，但这种成绩是以过去经济增长粗放程度过高为基数的，从总体上看，至今仍未实现根本性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格局未变。进入新世纪后，各地热衷于发展重化工业和耗能高产品，能源弹性系数大幅度提高，能源的瓶颈制约特别突出，情况如下表：

能源弹性系数（能源消费增长率/GDP增长率）

时**摇**期	GDP增长（%）	能源消耗增长（%）	系**摇**数
1981~1990	143	64	0.44
1991~2000	162	32	0.2
1996~2000	48.8	0	0
2001~2004	39.6	51.2	1.29
2004	9.5	15.2	1.6

摇摇资料来源：《中国统计的年鉴》。

针对这种严峻情况，中央《建议》在提出“十一五”期间的目标时，除了提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实现201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等外，特地提出，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即能源弹性系数要降到1以下，节约能源成为节约资源的重点。还要求，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本遏制，耕地减少过多状况得到有效控制等。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要实现主要依靠资金和自然资源支撑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投入劳动力素质提高和技术进步支撑经济增长转变，实现由资源—产品—废弃物流程，向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型转变。为此，必须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强化环境和生态保护，真正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是关系“十一五”规划能否顺利实施的全局性问题。

四、从体制机制方面逼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摇摇我国要落实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

① 参见《经济参考报》2005年7月14日。

② 参见王梦奎主编：《中国中长期发展的重要问题》，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6页。

益，除了要实施有利于自主创新、优化产业结构、节约能源资源的方针政策，完善法律法规以外，主要靠深化改革，形成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

第一，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从经济活动主角转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真正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政府不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政府要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但不能因此就自认为是经济活动的主角，主导经济资源的配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的主角是企业。“经营城市”是政府职能的大错位。政府不能办企业，这是早就明确了的，怎么能去做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城市呢？政府任期五年一届，每一届政府都要求有明显政绩，为此都追求短期（五年之内）效益最大化，不管后果怎样。外延式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最适合这一要求。2003 年以来，主要是地方政府为追求 GDP 的高速增长和形象工程，大搞开发区和市政建设，个个都要工业立市，铺摊子，上项目，外延式扩张，引发经济走向过热。资料显示，2003 年以来这一轮经济过热中，政府直接投资的比例超过 60%，政府通过廉价征用土地促成了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和开发区的过度膨胀①。在很多情况下，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调控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因而不得不采取行政手段。政府改革和转换职能已成为今后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

第二，深化财税改革。目前的财税体制促使各地热衷于粗放式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因为这样 GDP 增速快，财税收入高，而对发展高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不够重视。今后需考虑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降低间接税的比重。降低或取消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和资源性产品出口退税。开征燃油税、物业税。目前，中国的汽油消费税是美国的 1/10，是欧洲的 3% 到 5%，太低了。开征燃油税，能鼓励节约汽油。稳步推行物业税即房地产税，能抑制对房地产的过度需求，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建立与事权相适应的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体制。完善增值税制度，包括从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转变。财政资金不再投资于一般竞争性产业，而要投向公共服务领域。等等。还有，我国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极不完善，财政部材料，我国 15 万个矿山企业中仅有 2 万个矿山企业是通过市场机制取得矿业权，绝大部分是通过行政授予无偿占有的。我国矿产资源补偿费平均费率为 1. 18%，而国外与我国矿产资源补偿费性质基本相似的权利金费率一般为 2% ~8%。我国石油天然气的费率更低，为 1%，远远低于美国的 12. 5 和澳大利亚的 10%。

第三，深化价格改革，重点是使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能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之所以难转变，是因为我国的生产要素价格和资源产品价格长期受国家管制，严重偏低。资金的价格低，地价低，水价低，能源包括电价低。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立节地、节能、节水、节材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必须积极推进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改革，形成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节约利用资源，提高效率。我国能源价格长期偏低，比价也不合理。2004 年国内汽油、柴油出厂价格比新加波、鹿特丹，纽约三地市场进口到岸完税价格平均水平分别低 791 元/吨、837 元/吨；国内汽、柴油零售中准价较三地市场进口到岸完税价格平均水平分别低 231 元/吨、335 元/吨。国际上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比价关系大体为 1∶1. 5∶1. 35，而我国实际大致为 1∶4∶3，煤价明显偏低。国际上天燃气与原油按热值计算比价平均为 105∶1，而我国为 0. 4∶1，

① 参见《理论动态》1674 期（2005 年 6 月 25 日），第 8 页。

天燃气价格偏低[①]电力价格也偏低。因此，要节能，首先要调整过低的能源价格。国外有的经济学家曾对2500家公司做过一次研究发现，能源使用量的降低55%归功于价格调整的结果，17%是研究与开发的结果，还有12%则原于所有制形式的不同，其余则归结于工业所占份额的变化[②]。中国是淡水短缺的国家，可是水的利用效率较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消费的水资源相当于一些发达国家的4倍。重要原因，是水价低。国际普遍流行的水价构成包括水资源价格、水工程成本、水处理成本及水管理成本，而且还包括污水处理的成本。而我国的水价只包括水工程成本、水处理成本和污水处理费。2003年，城市的每立方米水价为0.15美元，而南非是0.47美元，美国是0.51美元，德国为1.45美元。可见，要节约用水，必须提高水价，用价格杠杆来限制水的滥用浪费。国外的一些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的研究结果是，水价从每立方米7.9美分提高到13.2美分，用水量减少42%；从15.9美分提高到21.1美分，用水量减少26%[③]。还要指出，由于从2004年冬开始，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率处于较低水平，2005年上半年只有2.3%，这正是调整资源产品和服务价格的大好时机。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及时调整价格，逐步使价格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

第四，改革干部政绩考核和提拔任用体制。干部政绩不能只看GDP（和绿色GDP）增速，更要看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包括就业、社会保障、教育、文化、环保、生态保护、医疗卫生以及社会秩序、信用、法治环境的改善等。政府职能没有很好转换或者转换不到位，关键是干部政绩考核和提拔任用制度不完善。不少地方官员，包括从事妇联、教育、卫生等工作的官员，也分配“招商引资”指标。以贱卖土地（甚至政府赔本进行土地开发）越权减免税办法争取外资，以及与外商站在一起，侵犯劳工合法权益等。在片面追求GDP增长驱动下，资源的滥用和破坏，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都可以放在一边。不改革这种祸及子孙后代的干部考核体制，就无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第五、深化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形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基础。产权归属清晰保护严格，市场主体会自动地追求质量和效益型的经济增长。深化企业改革，就要使长期依附于政府的国有企业和常常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民营企业，都成为具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经营决策权和独立承担风险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为此，既要引导民营企业制度创新，更要深化国企改革。许多国有企业由于其固有的机制缺损，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要继续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使国有资本更好地集中在能发挥自已优势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大企业中，而从一般竞争性行业和中小企业逐步退出，使资源得到更为有效的利用。对于仍需国有经济控制的领域，要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革，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垄断行业的改革需加快推进，积极引进竞争机制，允许新的厂商参与竞争，特别是非自然垄断性业务要放开。对自然垄断性业务则要加强监督，包括安全、环保、价格、普遍服务等监管。即使是自然垄断性业务，有些也可以通过如特许经营权拍卖，使其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并增进效率。垄断行业资源节约的潜力巨大，搞好垄断行业改

① 参见中国价格协会联合课题组：《“十一五”时期深化能源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研究》（2005年5月），第6~7页。

② 参见世界银行：《中国“十一五”规划的政策》（2004年12月），第70页。

③ 见段治平“《我国水价改革历程及改革趋向分析，》《中国物价》2003年第4期。

革，能大幅度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达到节约和合理使用资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的。

此外，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秩序，逐步理顺分配关系，提高外贸的质量、效益和利用外资的质量等，都将使我国经济运行逐步走上转变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轨道，从而使我国经济持续地实现快速健康发展。

五、注重社会公平，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

进入新世纪，中国国内不同地区和不同居民之间的收入、消费等差距继续扩大，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的问题，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和不安。根据国家统计局材料，2003年，经济比较发达的上海市和北京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46718元和32061元，而经济欠发达的贵州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3603元，只及上海市1/13和北京市的1/8.9，可谓差距惊人；人均消费水平，上海市和北京市为15866元和10584元，贵州省为1770元，只及上海市的1/9和北京市的1/6。反映居民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为0.4，到2004年，已上升到0.47，表明中国收入分配已达到很不平等的程度。在不断涌现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同时，2004年全国农村尚有年人均纯收入不足668元的绝对贫困人口2610万人，还有年人均纯收入在669～924元之间的低收入人口4977万人，两者合计为7587万人。近4年来，贫困人口中有60%以上为当年返贫人口。4000～5000万失地农民中①，有一半是既失地又失业者。上亿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往往没有很好保障。城市也有2千多万人靠领基本生活保障金过活。因此，我国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必须在经济发展基础上，更好地处理分配不公问题，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问题，着重提高上述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使他们能共享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成果。

在这一大背景，最近两三年，一些经济学家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出了质疑，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应抛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或改为效率与公平兼顾。我本人在2001年7月《经济研究》发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靠深化改革立论》短文中，曾提出：“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我认为是对的，是适用于相当长一段时间（比如直到2010年）的，因为我们的生产力水平低，在一段时间内要强调效率，使经济发展得尽可能快一点。而在经济经过三四十年的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趋于成熟、完善的时候，比如到2010年及以后，我们也许要对社会公平问题引起更高程度的重视，实行效率与公平兼顾、大体同等重视的原则。从我国当前出现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一般认为已超过0.4的警戒线的实际情况看，更要求我们关注社会公平问题，处理好收入分配关系，给社会的弱势群体予以更多的帮助。”现在看来，由于地区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分配不平衡的加剧，要求我们从现在即“十一五”时期起，而不是到2010年，就要实行效率与公平同等兼顾的原则，即从现在起就要更为关注社会公平问题，以贯彻以人为本、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观，并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打下良好的经济基础，即处理好不同群体的经济利益关系。

这次《建议》不只是要求“十一五”期间，随着经济的发展提高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而且特别注意收入分配的公正性和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大力发展科教文卫等各项社会

① 见王梦奎主编：《中国中长期发展的重要问题》，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189页。

事业，包括：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加大扶贫的力度，扩大社保的范围和提高社保的层次，逐步做实个人账户，采取切实措施解决群众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完善公共卫生和医疗救助体系，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制教育，发展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等等。在“十一五”时期，政府要加强公共服务职能，并按均等化原则公平地分配公共服务，解决城乡之间公共服务差距过大的问题。着力加强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公益性文化、社会救助体系和公共安全体系等建设。还要完善税制，通过加大个人所得税收征管力度等措施，调节过高收入，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措施，帮助经济欠发达地区，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和福利水平。

今后，政府应当着力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促进社会和谐。联合国驻华机构对中国“十一五”规划箴言提出，用相对适度的财政支出政策，就可以大大改善弱势群体的社会生存状况。比如，便利地获取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及医疗保健信息，可以预防 75% 以上的孕产期死亡和降低 70% 以上的 5 岁以下婴幼儿死亡率。如果政府能够把对小学、中学、大学三级教育的支出比率从现在的 1∶2∶10 变得更对称，就可以极大地缩小不同地区之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技能水平的差距。政府的公共服务要均等化。在健康领域，政府三分之二的支出服务于约 40% 的城市人口。各地政府每年人均卫生保健支出差异很大，从北京和上海的人均大约 200 元人民币到河南和湖南的不足 20 元人民币。这种状况必须改变。看来，这些意见是很值得重视的，也是“十一五”期间发展社会事业应很好解决的问题[①]。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05 年 10 月）
2. 《2005 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5 年 5 月版
3. 世界银行：《中国“十一五”规划的政策》（2004 年 12 月）
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外部环境》，《经济要参》2005 年第 29 期
5. 《中国改革高层论坛——以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推进体制创新》（2005 年 7 月 12 日——13 日，北京）
6.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研究》（2004 年 4 月）
7. 王梦奎主编：《中国中长期发展的重要问题》，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5 年 4 月版。

二〇〇五年十月

① 《促进中国的社会发展—联合国系统驻华机构对中国“十一五”规划的箴言》（2005 年 7 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关于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杨圣明

摇摇马克思曾经打算写一部关于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理论论著作。这个计划虽然没有实现，但也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其中之一是关于国际价值理论。这个理论，随着世界市场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强大威力。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它正在成为我们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实现国际关系中“双赢”和“多赢”的理论基础。本人不揣寡陋，将学习这个理论的一些体会写出来，欢迎批评指正。

一、国际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应用他的劳动价值理论考察世界市场时，创立了国际价值理论。这个理论有十分丰富的内容，涉及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哲学、数学等诸多学科。本文仅择其要者陈述之，可能挂一漏万。

1. 国际价值的成因

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是国际价值形成的土壤和温床。关于经济全球化，马克思曾经有过极其精辟的分析与描述。例如，他写道：“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①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和条件下，任何国家要生存和发展，都必须在世界市场上出口和进口大量的商品。而这些商品千差万别、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如何将这些商品进行比校和交换？它们比较和交换的基础是什么？比例关系如何确定？各自的盈亏又如何衡量和计算？诸如此类的问题迫使商品所有者去寻找他们都能接受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马克思总结了实践经验，从理论上找出了解决这类问题的根本法宝，即国际价值。所谓国际价值，简言之，就是各国的国别价值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54 ~ 255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又称国民价值）在世界市场上的转化形态。国内生产和交换中形成的价值称为国别价值，而国际生产和交换中形成的价值则称国际价值。它们二者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对此，下面再作详细分析。

2. 国际价值的实体

国际价值的实体是生产某种商品所消耗的（凝结的）世界劳动或国际社会的人类抽象劳动。马克思写道："把价值看作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① 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国内价值而且更适用于国际价值。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在国际范围内也同样适用。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而抽象劳动创造国际价值。这种抽象劳动是抽象范围更大抽象程度更高的劳动。不懂得劳动二重性学说，不理解世界劳动的抽象性，就根本不能理解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在一国之内，国民价值的实体是该国的正常质量或中等强度的抽象劳动。而 "在以各个国家作为组成部分的世界市场上，情形不同了。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② 这样，任何一个国家的正常质量的劳动或中等强度的劳动都不可能成为国际价值的实体。它们在世界范围内，只能处于个别劳动的地位。这些个别劳动，在全球范围内，在世界市场上，经过更高程度的再抽象，转化为世界劳动。这种抽象的世界劳动就构成国际价值的实体。各国的个别劳动如何转化为世界劳动？这要靠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马克思写道："只有对外贸易，只有市场发展为世界市场，才使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抽象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③ "在世界贸易中，商品普遍地展开自己的价值"。④ 准确地说，在世界市场上展开的这个价值，就是国际价值。

3. 国际价值的量

国际价值量是指国际价值的大小、多少问题。任何事物既有质的规定性，又有量的可度性，国际价值自然不例外。所谓国际价值量就是生产某种商品所消耗的国际社会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又称国际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马克思指出，"棉花的价值不是由英国的劳动小时，而是由世界市场上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⑤ 生产某种商品所消耗的劳动时间，各个国家是不同的，有的国家多些，有的国家则少些；不管哪个国家的劳动消耗的时间，都不能成为国际社会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这个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更不是某个国家或某个大人物规定的；而是在生产经营者背后，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它一旦形成，就 "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象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⑥ 由国际社会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国际价值量是世界市场上衡量商品经营者优劣、好坏的客观标准。劳动消耗少于这个标准的是先进者，而多于这个标准的，则是落后者。前者发财致富，而后者则破产倒闭。由此可知，国际价值量是商品生产经营者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24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613 ~ 61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Ⅲ）第 278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163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Ⅲ）第 112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92 页。马克思在这里所称的 "自然规律" 系指价值规律。

的生命线，是催促各国的生产经营者不断前进的无情的鞭子。

4. 国际价值的尺度

衡量国际价值大小的尺度有三种：世界货币、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和世界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在国内，价值量大小、多少的衡量尺度有两个：外在尺度是货币，内在尺度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两个尺度有紧密联系。“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观形式”。① 与此不同，在世界上，衡量国际价值大小、多少的外在尺度是世界货币，内在尺度是世界劳动平均单位和世界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进入世界市场，各国的货币必须脱下民族服装，恢复原来的贵金属块的形式，即把国内货币转化为世界货币。当世界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也与国内市场上的情形不同。在国内市场上，只能有一种贵金属充当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在世界市场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双重价值尺度，即金和银”。② 为什么要用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作为衡量国际价值的内在尺度？对此马克思写道：“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中等的劳动强度，在这强度以下的劳动，在生产一种商品时所消耗的时间要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以不能算作正常质量的劳动。在一个国家内，只有超过国民平均水平的强度，才会改变单纯以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价值尺度。在以各个国家作为组成部分的世界市场上，情形不同了。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而这又表现为更多的货币”。③ 显然，在一国之内只有一个中等的劳动强度，而在世界上则有众多国家的中等劳动强度，并组成一个阶梯。但是，它们之间缺乏比较的基础。所以，要采用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将各国不同的众多的中等劳动强度的劳动加以折算，以便计量和比较国际价值量的大小或多少。只有如此，才能改变单纯以劳动时间来计量的价值尺度。在劳动世界，马克思提出的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借助于它可以把各个国家的难以直接对比的劳动转化为可以直接比较的劳动，使“一个国家的三个劳动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劳动日交换”。④ 在货币世界，“欧洲货币单位”刚出现时，曾被讥笑为“怪物”。而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它的巨大作用。正是借助它，欧洲各国的不同货币制度才走向了统一，货币由多元化转向了单一化，出现了“欧元”。没有昔日的“欧洲货币单位”，就没有今日的“欧元”。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类似于“欧洲货币单位”。借助它将使各国不同的劳动转化为世界劳动，使劳动的多元化转化为一元化，使国内价值转化为国际价值。这一点将被历史证明。

5. 国际价值规律

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中只有一条价值规律。所谓国际价值规律仅指“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应用、延伸或变形”。⑤ 无论如何不能把国内价值规律与国际价值规律看作两条根本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11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16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613～614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 112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614 页。

同的规律。这一点，必须言之在先。否则，会引出不少理论上的混乱。

根据马克思的著作所述，国际价值规律的要求至少有三个特点：

（一）同一劳动时间内，不同国家创造不同量的国际价值。马克思写道：“在以各个国家作为组成部分的世界市场上，情形不同了。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应用，还会由于下述情况而发生更大的变化：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① 由此可知，生产效率和劳动强度小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二）不同劳动时间内，不同国家创造相同数量的国际价值。马克思写道：“在一个国家内，亏损和盈利是平衡的。在不同国家的相互关系中，情况就不是这样。即使从李嘉图理论的角度看，——这一点是萨伊没有注意到的，——一个国家的三个劳动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劳动日交换。价值规律在这里有了重大变化。或者说，不同国家的劳动日相互间的比例，可能像一个国家内熟练的、复杂的劳动同不熟练的、简单的劳动的比例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困的国家，甚至当后者像约·斯·勒在《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从交换中得到好处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② 当前，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以三个劳动日同发达国家的一个劳动日进行交换，其中的剥削是显而易见的。

（三）剥削与“双赢”并存。既然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剥削的地位，为什么还要进入世界市场进行商品交换呢？这是因为，暂时落后的国家，在国际交换中“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物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③ 简言之，落后国家在出口方面吃亏，而在进口方面获利。目前，国际经贸谈判经常听说获得“双赢”、甚至“多赢”的结果。这表明双方、多方都获利了，但谁获多少利，则没有准确数字，肯定一方利多，另一方利少，双方相等者甚少。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指出，“两个国家可以根据利润规律进行交接，两国都获利，但是一国总是吃亏，……一国可以不断摄取另一国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④ “处在有利条件下的国家，在交换中以较少的劳动换回较多的劳动”。⑤

6. 国际价值转形

国际价值的转形就是国际生产价格。它与国际价值的区别就在于国际平均利润的形成。为此要弄清两个问题：为什么要形成平均利润？怎样形成平均利润？平均利润并不是资本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613～61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Ⅲ）第 11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265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第 401～402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265 页。

的企望，而是从等量资本必须带来等量利润与等量资本又难以带来等量利润的深刻社会矛盾中生出的多味果实。它的形成经过了长期的激烈的市场竞争。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平均利润始自威尼斯商人时代。他写道“威尼斯商人在列万特各国，汉撒同盟的人在北方各国，购买商品时每人所支付的价格都和邻人一样，商品花费的运费一样。他们出售商品所得到的价格也和‘民族’的所有其他商人一样，而且在购买回头货时支付的价格也一样。因此，利润率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均等的。对大贸易公司来说，利润要按照投资的大小来分配是理所当然的。”①

恩格斯还详细描述了平均利润形成的过程。他写道：“威尼斯人、热那亚人、汉撒同盟的人、荷兰人——每个民族都各有特殊的利润率，甚至每个销售市场当初都或多或少各有特殊的利润率。这些不同的团体利润的平均化，是通过相反的道路，即通过竞争来实现的。首先，同一个民族在不同市场上的利润率得到平均化。如威尼斯的商品在亚历山大里亚得到的利润大于在塞浦路斯、君士坦丁堡或特拉比曾德得到的利润，那么，威尼斯人就会把更多的资本投入对亚历山大里亚的贸易，而把相应的资本从其他市场的贸易中抽出。然后，在向同一些市场输出同种商品或类似商品的各民族之间，也必然会逐渐发生利润率平均化，其中有些民族会遭到破坏，从而退出历史舞台”。②

1492 年后的地理和商业大发现（古巴、海地和巴哈马群岛的发现，北美大陆的发观，绕过非洲南端到达印度的航路的发现以及南美大陆的发现等），使国际贸易的范围大大扩展了，使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更加突出了。这种情况对于利润的平均化有何影响？恩格斯指出：“在新的地区主要由国家建立的殖民地越多，商会贸易就越会让位于单个商人的贸易，从而利润率的平均化就会越来越成为只是竞争的事情”。③

恩格斯在世时，国际上的利润平均化过程还仅局限于商业和国际贸易的范围之内，尚未进入工业、农业等物质生产领域。因为这时的机器大工业并不普遍，仅限于少数的欧美国家，而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以自耕农为主的自然经济的农业时代；国际上的剩余资本还并不多，而且由于种种障碍又无法在国家之间进行转移。这样，在国际范围内的工业、农业等领域便无法形成平均利润，自然也就无国际生产价格可言了。因此，恩格斯指出：“在国内单个生产者之间进行的零售贸易中，商品平均说来是按照价值出售的，但是在国际贸易中，由于上面所说的理由，通常都不是如此。这种情况和现在的世界相反。现在，生产价格适用于国际贸易和批发商业”。④

恩格斯逝世后一百多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平均利润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涵盖绝大多数国家和工业、农业以及服务业等主要产业的一种强大的历史趋势。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既是各国走向世界市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过程，又是全球范围内利润平均化的过程。各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资本有机构成不同，资本周转速度不同以及管理水平不同，必然存在着高低不同的利润率。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和劳动力必然从利润率低的国家和地区流向利润率高的国家和地区，而利润率高的国家和地区由于资本和劳动力增多，供给增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102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102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1023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1024 页。

加，利润率水平将会逐渐下降；而原来利润率低的国家和地区由于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出，供给减少，在需求不变甚至增加的条件下，利润率将会提高。这样，由高到低与由低到高的两种相向力量作用的结果，逐渐形成均等的或平均化的利润率。国际平均利润一旦形成，国际价值也就自然转化为国际生产价格。

有的同志往往提出这样的问题：资本和劳动力还难以在国际间流动，因此无法形成平均利润和国际生产价格。的确，国际上还存在着严重的保护主义，还存在着不公平竞争，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壁垒。资本自由化、劳动力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等等还名不副实。发达国家往往强调资本自由化，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市场，而对劳动力自由化却横加阻挠，企图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入发达国家；与此相反，发展中国家则强调劳动力自由化，希望将国内多余的劳动力转移至发达国家，而对资本自由化则有许多顾虑，不愿开放资本市场。这两种相反的态度受历史条件制约，在当前条件下还难以避免。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社会经济条件将发生变化，阻碍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的条件将逐步减弱以至消失。与此相适应，资本和劳动的流动将由少到多，逐渐扩大。如果把目前的流动规模同 50 年前相比，同 100 年前相比，就会发观惊人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仅仅 20 多年，进出中国的资本和劳动力规模发生了多么大变化，增长了多少倍！从较长时期考察，国际间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的速度在加快，流动规模在扩大，具有明显上升趋势。这种趋势就是利润率平均化趋势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国际生产价格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土壤和温床。

7. 国际价值同货币、价格、工资的关系

马克思写道：“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所以，货币的相对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发达的国家里，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太发达的国家里要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名义工资，即表现为货币的劳动力的等价物，在前一种国家会比在后一种国家高；但这决不是说，实际工资即供工人支配的生活资料也是这样”。[①] 马克思的这段话告诉我们三个问题：

（一）国际价值同单位货币的相对价值成反比。在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同种商品时，发达国家比不太发达国家，由于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高，能够生产出较多的商品，并创造出更多的国际价值，因而表现为更多的货币额。这样，每单位货币的相对价值就小；与此相反，不太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由于劳动强度低，生产效率低，只能生产出较少的商品，创造较少的国际价值，因而表现为更少的货币额。这样，每单位货币的相对价值就大。显而易见，创造的国际价值量越多，而单位货币的相对价值量就越小，二者成反比。

（二）发达国家比不太发达国家的商品价格水平高。由于发达国家的单位货币的相对价值小，表现同样的商品价值需要更多的货币，因而，商品的价格水平必然高些；相反，由于不太发达国家的单位货币的相对价值大，表现同样的商品价值需要的货币较少，这样，商品的价格水平就必然低些。当前国际上，价格的实际状况与此论断相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614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